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〇九期 ——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412c)

【动态报导】凤凰卫视就林彪事件采访扎格沃滋丁的报道	史 学
【亡灵祭坛】陈寅恪的最后岁月	陆键东
【史海钩沉】陶铸在最后的日子里	权延赤
【往事追忆】历史不会忘记你们 ——纪念遇罗克以及反对血统论的勇士们	林 森
【特别审判】罪与罚——给林彪、江青集团主犯量刑	图们·肖思科
【资料汇编】文革中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欧阳龙门
【往事如烟】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 (五)	老 田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动态报导】

凤凰卫视就林彪事件采访扎格沃滋丁

• 史 学 •

(扎格沃滋丁为调查 9 1 3 坠机的前苏联克格勃人员。)

凤凰卫视提出几条有价值的证据：

(1) 苏、蒙从林彪坐机一起飞，就捕捉到雷达信息。因此，对于林彪坐机的飞行路线，苏、蒙有权威的话语权，而不应该是孙一先的那张业余水平的路线图。苏方人员认定：飞机飞到苏、蒙边界，确实向南折回!!! 孙一先对尸体分布情况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叶群和驾驶员同在驾驶舱，是可信的。

(2) 苏方人员确认飞机料油是足够的。既可飞抵赤塔，也可飞抵温都尔汉。而且还有良

好的自动驾驶系统。因此，王海等所谓的“飞行专家”，在当时政治环境下作出的飞机坠毁的原因结论：油料不足，导致迫降，是不可信的。需提醒大家的是，当时官方仅对“坠机原因”作了“分析”，而且这个唯一的分析，事实证明是错误的！那么，如果飞机是在叶群和驾驶员正常的操控下，从苏、蒙边界向南折回祖国，是否说明飞机上发生了重大事件？！

（3）苏方人员确认机上没有发生枪战和搏斗。是否可以认为是林总下令看押了林立果，命令叶群押机返回？！

（4）苏方人员第一次到现场就拿走了黑匣子。这个最重要的证据之一的黑匣子，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都是开着的。一个多小时的飞行，包括周总理的呼叫，都应记录在案，而且苏方保护很好！除此以外，苏方还保有大量其他物件（苏方极为重视，连勃列日涅夫、多波罗波夫都亲自指挥。）因此，黑匣子解密之时，就是林案重见天日之时！这个举世瞩目的黑匣子，官方已无法“毁灭罪证”了！

（5）苏方人员确认，还有许多事实没有对外公布，留下了很多的想象空间；俄国现有许多历史研究所都对林案有着浓厚的兴趣，正密切关注着林案的每一点动向。

（6）香港卫视有专门记者常驻俄国，采访俄国的当事人，很方便。

（7）我国对坠机的现场第一当事人孙一先对王海等飞行专家，提出的“机内爆炸说”，从一开始就不以为然！对“枪战”说，更是斥之以鼻：无稽之谈！当时他人微言轻，现在他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目击证人”。

（8）当时，中、蒙关于飞机性质的“军、民之争”的核心，就是蒙方要为击落飞机找合理借口，而我方则不愿给对方以口实！孙一先当时的倾向性意见，就是蒙方导弹击落！孙一先通过调查，当时苏、蒙在坠机现场的兵力、火力部署，完全具备击落飞机的能力！蒙方还向苏方请示，是否要击落飞机？后来是周恩来直接干预，中方才自行放弃对飞机被击落说法的追究。需要提醒的是，苏联击落过南朝鲜的民航客机，至今不肯向世人承认!!! 利比亚对其击落民航机一事，作出重金赔偿!!!

（9）苏方认为坠机之前，机上人员已全部死亡。苏方凭何证据得出这一结论？令人深思!!!

（10）苏联已解体，这些被访人员作假证的可能不大。至少有不少话是可信的！

~~~~~

## 【亡灵祭坛】

陈寅恪的最后岁月

• 陆键东 •

—

据黄萱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若去看望陈寅恪，须先向历史系的掌权者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能登门探问。但数年间她还是有一些机会与陈寅恪见面。有次，陈寅恪突然问她“反动”二字作何解，黄萱无言以对。“通识”如陈寅恪，竟有如此一问，其悲愤莫名的心境可以想见。又有一次，陈寅恪对前来探望他的黄萱说：“我的研究方法，你是最熟悉的。我死之后，你

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黄萱回答：“陈先生，真对不起，你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寅恪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了我的毒。”二十年后，回首往事，黄萱这样说：“我的回话陈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东西又怎忍欺骗先生？陈先生的学识恐怕没有什么人能学，我更不敢说懂得其中的一成。”陈寅恪这些话表明，“没有参加运动”的老人，对形势并不陌生，他的思维依然清晰与敏锐。

从一九六六年冬开始，陈寅恪多次被迫作书面检查交待，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重新补充交待。据个别看过这些书面交代的人回忆，这些交代材料也有“文革”期间人人都不能不写的套话，但真正最能显示陈寅恪心态与风骨的，还是陈寅恪数次递交的“我的声明”。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陈寅恪便有这样的一纸“声明”：“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二十年间，晚年的陈寅恪为历史留下了多份“声明”及申述书函。从用词到行文风格，这份“声明”与陈寅恪以往的“声明”极为相似，当是陈寅恪发自内心的情感的文字无疑。在最混乱的一九六七年，陈寅恪的“尊严”，一有机会仍顽强地展示。

可惜，相似的展示在今天已迹近难寻。那么，支撑著这位早几年已平静地等待死亡降临的文化大师，度过一千多个恐怖与痛苦日子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一份当年中山大学编写的“形势报告”，有一股充满了极“左”语言的叙述，为我们猜测陈寅恪在这三年的精神状态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原始资料。在陈寅恪生命最后的一年，中山大学对“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曾有如此描述：“陈寅恪对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共产党是不甘心的”（原文如此——引者）。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样灭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大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也确实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著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

“文化大革命”的无限上纲上线、极尽断章取义之能事等等做法早为世人所厌恶。所以“文革”期间的材料可信程度应打上问号。但陈寅恪“一直态度十分恶劣”，引起群众愤恨至极，则完全有可能折射出历史的真实——陈寅恪纵死也“不甘心”。在中山大学当年的“总结”或“形势报告”一类的材料中，对“反动学术权威”一类的人用上“反动透顶，恶毒至极”等评语，并咒骂“就让他带著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陈寅恪是唯一一人。需知，这样的语言还是来自比较“正规”的校方正式文件、学习材料之中。

校方痛斥陈寅恪“兴亡遗恨尚如新”一句诗，出自“论再生缘”中陈寅恪感叹与陈端生感同身受而吟咏的一首七绝。诗云：“红杏青松画已陈，兴亡遗恨尚如新。山河又送春归去，肠断看花旧日人”。“造反派”们只是凭直觉认为“兴亡遗恨”与新旧政权有关。中山大学前历史系教授何肇发二十多年后这样认为，幸亏当年“造反派”根本读不懂陈寅恪的诗，不然陈寅恪极有可能当场被打死。痛哉斯言。

另据知情者回忆，“文革”期间“造反派”曾令金应熙等人“注释”陈寅恪的诗作。故陈寅恪的“反动诗作”也成为陈寅恪的一条罪状。

“不甘心”的陈寅恪，微弱的生命之火竟忽明忽暗地残存了一千多个日子，直到耗尽了最后一缕不平之气。从一九五九年陈寅恪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公开表达“死”的意志开始，“死亡”

的话题从此若隐若现地伴随著他的余生，但他一直顽强地活著。当无数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死来解脱生命所不能承受的屈辱与重压时，甚有条件自行了断此生的陈寅恪，却表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生存意志。

陈寅恪的“不甘心”，绝非如“造反派”所认为的为了“蒋家王朝”。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的官方档案中，明确地记载着这两个“备战”风云甚浓烈的年头。陈寅恪对形势有如此判断，“他对国民党是否有能力反攻大陆表示怀疑”。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他（陈寅恪）表示高兴，认为我国有了核力量将会更加强大。”这些记载表示，陈寅恪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分析与评估，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睿智。

## 二

陈寅恪没有死于精神崩溃，而是死于生理机能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折磨。

令陈寅恪最感痛苦的折磨，是在“文革”中已成帮凶的一物——有线广播的高音喇叭。

东南区一号刚好坐落在康乐园中区的制高点大钟楼的对面，有两年的时间，陈寅恪日夜为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所包围，痛苦不堪。在正常时期，陈寅恪尚且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在这段岁月陈寅恪如何忍受苦不堪言的摧残，想来其真相已永远不足为外人道矣。造反者知道陈寅恪不能“看”，但可以“听”，便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以听觉达到摧残的手段。每当召开大型批斗会，便将几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了陈寅恪的床前，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二十年后，梁宗岱的夫人在其用血和泪写成的《宗岱和我》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活活给吓死了。

陈寅恪不一定是被高音喇叭吓死的，但梁夫人为这一野蛮行径添了一个有力的旁证。

陈寅恪的心脏病日趋严重。

折磨，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后进入高潮，陶铸被打倒，各路打著不同旗号的“造反派”纷纷上门逼令陈寅恪交代与陶铸的“黑关系”。用“惨无人道”一词来形容，并不为过。一九六七年夏，唐□心脏病发作，濒临死亡。大概是在这个时候，陈寅恪写下一副“遗恨塞乾坤”的预挽爱妻的对联。联云：

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牛衣对泣”的古典，比喻为夫妻共守穷困；“废残难豹隐”，道尽人生的无奈：天欲绝陈，先毁其目，后夺其足，即便命运如此，欲觅一避世隐居处了此残生也不可求。这副“预挽妻联”语气极之凄凉。

唐□经年为病痛所困。在晚年，陈、唐两人一直认为唐□将先陈寅恪而去，这也是陈寅恪向唐□生前预撰挽联的一个内情。在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之际，这对四十载相依为命的夫妻，

陷入了“生不如死”的境地。在这段时期，陈寅恪向校方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内云：“一，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二、唐口现担任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作，和清洁工杂工工作，还要读报给病人听，常到深夜。精神极差。申请暂时保留这位老工友，协助厨房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唐口力小头晕，有时扶不住，几乎两个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资二十五元。饭费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口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又，如唐口病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死了也无人知道”。如“婴儿一般”失去旁人护理便无法生存的陈寅恪，在这一刻充盈著丈夫的怜惜之情。在陈寅恪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被无限上纲上线的日子里，陈寅恪的“申请书”，无疑是用生命写就的。

此时，陈、唐两人相依相存的情势已变成唐口一人独力撑承两个生命的重荷。陈寅恪虽有两个女儿同在中山大学工作，但二女儿早在六十年代前期就搬出娘家另住教工宿舍。三女儿也在一九六六年结婚迁出另筑小家庭。革命的风暴也给这些“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带来很大的伤害。陈家女儿们除了要参加运动外，平时还不敢随意回娘家探望父母，免招来批判。在斗争陈寅恪时，据说陈寅恪的亲属也有人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陈寅恪是大特务，陈家女儿也是特务”。亲属中还有人贴大字报云“要坚决划清界线”。“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千万个家庭亲情的伤害，也在陈寅恪一家中有所反映。

对于实际上已“死”过许多回的人来说，所有的伤害已变得微不足道；人生，很淡漠……

### 三

死亡的气息终于逼近。

一九六九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二楼已住了十六年的家。责令陈氏搬家是在生活上的一种迫害。陈寅恪被迫搬家的直接后果，便是加速了陈寅恪的死亡。“文革”结束后，陈寅恪获得“平反”，当时迫令陈氏搬屋的理由被解释为“因为‘工宣队’看中这座楼用来作指挥部”。一位对陈寅恪晚年甚为了解的朋友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如果陈寅恪不搬家，也许还可以多活几年。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转发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报告——《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份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百万知识分子在整整三年的浩劫中第一次有了片刻的喘息机会。十九天后，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春节来临。给予知识分子以“出路”的这个中共中央文件，未能挽回陈寅恪的命运。

一九六九年三月五日，中山大学在一份《坚决落实毛主席对知识分子“再教育”和“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对于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要注意加以区别。像陈寅恪，一贯利用学术，坚持反动立场，恶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应划为反动学术权威，要把他们批得比狗屎还要臭。以后，给予一定的生活费，养起来作反面教员”。不能给陈寅恪“出路”的症结就在这里。其时陈寅恪已搬到西南区五十号的平房宿舍去了。陌生的环境，已不成样子的家，并未放松的逼迫……痛苦的一生在这一年已走到尽头。

在这最后的时刻，甚少有人知道陈寅恪的真实生存状态。校园大部份人（包括陈寅恪两个女儿）都去了“五·七干校”，只有革委会与“工宣队”等权力机构偶尔派人上门察看一番。“文革”结束后，校方传出陈寅恪在最后的日子里还“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这个说法，正是源自这段“革委会”偶尔派人上门察看一番的时期。真相如何，恐怕永远都不可探究。因为直至陈寅恪死后，中山大学的有关材料依然用充满了“阶级仇恨”的语调，评价“比狗屎还

要臭”的陈寅恪的所谓政治态度，死不悔改的陈寅恪，死后依然遭到诅咒。而民间的传说，则更接近人物的性格，据说陈寅恪临终前，校方最后一次派人上门查看，陈寅恪断断续续表达了两个观点，一为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二是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时中国与前苏联在珍宝岛地区发生了一连串武装冲突，两国总理为此就边界地区领土问题举行为世界瞩目的外交谈判。陈寅恪为此事而表态，不知北京方面是否曾就此问题征询过陈氏的意见。而“行将就木”的历史学家承认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表明陈寅恪最终仍与共产党“划清了界线”——这就是这个传说最传神的一笔，当年人们已这样理解陈寅恪。民间传说很生动，似乎也“很可信”！

比较肯定的情形是，在这生命最后的二百来天里，陈寅恪已瘦得不成样子，少数的亲朋好友偷偷登门看望，他也一语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晨五时许，陈寅恪走完了他七十九年的人生历程，因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而含冤去世。

对自己的结局，有一点是陈寅恪预测落空的，那就是他先爱妻而去。正因为这样，在他去世后，令人很伤痛的一件事发生了。四十五天之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晚八时许，陈寅恪的贤妻唐口亦追随九泉下丈夫去了。按一般的说法，唐口死于心脏病、脑出血，但在这四十五天中，唐口从容为自己安排后事。她嘱咐从四川赶来帮忙料理陈寅恪后事的大女儿流求，若她死后不必再从四川来广州了；并一再寄语三个女儿要好好团结。在这四十五天，唐口连一些细微的事情也安排考虑到了。她曾对人言：“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唐口去世后，她这种异乎寻常的安排便解开了生与死的谜底。

死，是轻而易举的。唐口大半生靠药物维系著生命，只需停药数天，生命的苦痛与哀伤便永远结束。十八年前，“我敬姊志节”的唐口曾满怀感伤之情写下《哭从姊琬玉夫人》的悼念诗，诗中两次提到“琬玉夫人”殉夫事，并以敬怀的笔触写下这样两句：“姊母殉夫死，姊亦传其烈”。十八年后，抹不掉的人生烙印以死亡的形式显现。

七十一岁的唐口，平静地了断了缠绕了七十一年的人生之凄苦，为陈寅恪而活著的唐口，亦为陈寅恪而死。陈寅恪的人生，应该延续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这一天。

□ 选自《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二十章（三联书店出版），略有删节  
~~~~~

【史海钩沉】

陶铸在最后的日子里

• 权延赤 •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晚，合肥已是满城灯火，一架专机拖著凄厉的长啸朝机场跑道滑落下来。

一切都发生在静悄悄之中，然而，坐落在西郊的解放军某部医院，有间房子里的电话却惊心动魄地响起长铃。等候已久的一位负责人抓起听筒：“嗯”了几声便放下话机，起身说了一声“走！”一名医生和二名护士闻声而动，随那人匆匆奔向“秘密病房”。

不一会，从机场开出的那辆黑色轿车便在“秘密病房”前停下。车门打开，一个面戴口罩、

身穿呢大衣、手拄拐杖的人缓缓走下车。他在冰凉的夜风里立住脚，而后缓缓四顾，像是与这自然界作告别，然后一直走进为他“精心安排”的“秘密病房”。

这是朝北不见阳光的“阴间”，其实朝南也徒然，窗口用木板钉死，又蒙了厚实的窗帘，门口对着走廊，进来时他已看清走廊的一头从地到楼板全部堵死，耗子也钻不进。只留下一道门进出。病床矮得出奇。显然床腿被锯掉一截，大约是怕“跳床”自杀吧？

陶铸！“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虽然为重病缠得人憔悴，但他无疑是那位名字曾经隆隆地响遍中国大地的陶铸。

可是，就从这天晚上起，这位身陷囹圄的“保皇派”连陶铸这一真实姓名也如同他的自由一样被剥夺了。病历上写著“王河”的化名，那是押送者为他起的名字，所有监护人也都将“陶铸”封闭在心里，只叫他“王河”。

陶铸就在这个封闭而窒息的环境中开始了他的“特护”生活。他依稀记得是去年，一九六八年的八月，自己在“批斗刘邓陶大会”上又挨了痛打。不久便开始头晕、眼花、想呕吐，他讲明情况，要求检查治疗，却一直拖到一九六九年三月才获准去医院检查，他做了大手术。亲人和医生都说是胆囊切除术，他也对所有人说是胆囊切除术，然而，当他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扒后仰，大汗淋漓之际，还是脱口叫出一声：“没想到癌是这么痛！”

由于病菌和精神的双重折磨，陶铸到安徽不足一星期，便完全不能起床，不能吃饭，不解大便；再不作病情检查，很快就会饿死！

十月二十三日深夜，医院里的人都睡了，监护人员悄悄进了“秘密病房”，给陶铸戴上口罩，用担架把他悄悄抬到放射科。检查证明，病情已非常危重，肠子粘连，并发展成为完全性肠梗阻。

腹腔打开了，无影灯下，医生目瞪口呆，淋巴结广泛转移，癌组织满腹都是，大的如蚕豆、小的如绿豆，血管焦脆，稍碰即破，随时都会引起大出血，手术根本无法进行，折腾大半夜，腹腔打开又缝合，连肠梗阻也未能解决。

极度衰弱的陶铸，手术中流了大量的血，却没为他输一滴血。

在最后的日子里，陶铸忍受了极大的痛苦。护士亲眼看到了他癌痛发作时的情况：“他坐起趴下，趴下坐起，一刻也无法安宁。”那天，癌痛到极点，陶铸的身体剧烈地抽搐著，触电一般，每一条筋，每一束神经，每一块肌肉，每一个细胞都在战栗，病床在他身下咯咯作响。蓦地，他举起一只手，携了飓风之势猛然挥出，仿佛要扫荡一切彷徨不安，粉碎所有的痛苦哀愁……

砰！一声响亮，陶铸的手重重拍在墙壁上，像旷野里轰响的巨雷，监护人都吃了一惊，那白壁上，粘汗沾掉墙皮，清清晰晰留下一只手印。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二十二时十五分，陶铸的生命之火熄灭了。

十年后，陶铸的骨灰由曾志母女埋入广州白云山，上面立了那块突兀嶙峋的花岗岩巨石，石上的“松风”二字是吴作人手书。

广州市老领导林西，听说了陶铸逝世前的情况，含泪派专人去当年陶铸被囚禁的医院：“查

查去，那个手印还在不在？如果还在，一定要拓下来……”

那手印居然被保存下来了，鲜明如初！

手印被拓回来，石匠连夜上山凿刻在“松风”石上。

~~~~~

## 【往事追忆】

历史不会忘记你们  
——纪念遇罗克以及反对血统论的勇士们

• 林 森 •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的下午，我们班六个红卫兵杀气腾腾的闯到我家，勒令我把全家的户口本交给他们，并发出通知：将遣送我们回山东原籍。

一付“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使我无法沉默于荒谬的举国大辩论之中。由于父亲是右派，于是就惹来杀身之祸，并牵连了无辜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妹，使我们全家在那偏远的荒芜之地经历了十二年的艰难岁月。

二个月之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转机，使我们很快返回了北京。衣食住行暂时有了安排，在一切都是临时的施舍中度日，那种被剥夺了尊严的痛苦依然压抑着我的心，因为血统论依然没有被推翻。

我每天外出看大字报，买各种出版的小报。我也有收集小报的癖好，可惜第二次抄家强制遣送我们时，都未能随身携带。有一天，我在王府井书店的外墙上发现了一张十六开大小的手刻油印小字报，题目是：出身论：署名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思想。文章用极为理性的观点，简单明了的驳斥了这付对联的荒谬，同时极有说服力的例举了一些国际共产主义先驱的个人出身和信仰，都不是出自于这付血统论的模式……。

在那个充满红色恐怖的时代，这篇文章就像沙漠中出现了一片绿洲，当时的我仿佛看到生命的一线希望。我激动的将它抄下来；并用复写纸同时复制出好几份，还给了我哥哥和几位出身不好的朋友。

过了几个月之后，我突然在街上买到一份《中学文革》报，全篇登载了“出身论”这篇文章，整幅报纸也都是以这篇文章和血统论对联为主题进行探讨和批判的。在《中学文革报》之后，社会上相继出现了多份报纸，主题内容都是探讨“出身论”这篇文章的，有支持的，有谩骂的，有恐吓的，恐怖的气氛不减当年的红八月。

《中学文革报》一共出版了六期，我买了全部，而且是怀着激动的心情阅读完每一篇文章。因为只有它是旗帜鲜明的屹立在众多的小报之中。由此可见，“出身论”已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值得欣慰的是社会并没有遗忘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狗崽子。

后来我知道《中学文革报》是北京四中学生办的，地址也在四中。我设法通过警察岗楼打听到四中的地址，当时，我只有一个冲动的念头，就是找到这份报纸的组织，向他们表达自己



支持与赞同的观点，参加他们的活动，尽一份自己的力。因为我坚信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当我找到四中校址后，使我看到的是一片恐怖的景象，如“砸烂四中黑报店”之类的大字报口号，包围着四中的大门，围剿着《中学文革报》，我看到这种景象，认为报址不可能在此生存、又不知道哪里去寻找？“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的出现，在当时我那暗淡的生命中升起了光明的希望。

运动风云覆雨的变化着，六七年九月七日半夜，我和家人第二次又遭到了抄家和强制遣送的命运，“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从此就被埋藏在我的心中。七零年听到遇罗克被枪毙的消息，才得知他是那篇文章的真正作者，同时也听到有关他家人的遭遇极为悲惨，以及《中学文革报》其他工作人员为此所付出的代价的故事。遇罗克和《中学文革报》，就这样献身于那个残暴的年代，我却永远没有忘记这个名字。

一九七三年冬天，经一位朋友介绍到牟志京家去做客，我才知道他就是《中学文革报》的创办人和主编，那时他已为那段历史划上了句号。正在山西山阴县插队。我们只是匆匆一见。事隔六年之后的一九七九年，在那位朋友家里，第二次碰到牟志京，他当时已是北方交通大学的研究生了。我们谈到《中学文革报》，遇罗克，以及所有受牵连的参与者的命运。我也谈了我当时的感受和举动。历史就是这样让我们在曾经擦肩而过的数年之后，才感受到相见恨晚的遗憾。从北京到美国我和牟志京成了莫逆之交的好朋友。

十二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我们全家成了真正的无产者，只有那份手抄的“出身论”保留下来了。一位了解我经历的好朋友搞到一份《中学文革报》的第一期原件，并把它当成礼物送给我。后来牟志京告诉我，遇罗克的父母需要这份原件材料，因为公安局基本同意为遇罗克平反了。我毫不犹豫的让牟志京把这份报纸送给了遇罗克的父母。听说他父母收到后很高兴，并向我表示谢意。这只是我唯一所能做的一点事情，以表达我对遇罗克深切的怀念和崇敬之情。

后来牟志京介绍我和《中学文革报》的另两位参与者赵金星和陶乐颂认识。在这之前我曾听到过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六九年春天，我通过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的朋友转到山西夏县去插队。七零年这位朋友因政治原因，在回北京探亲时，被关押在西城公安分局的拘留所。当他被押解回村后，对我们讲到狱中的见闻时有这样两段故事：

（一）有一天拘留所放风，看守用嘲讽的口吻对他说：“中国七十年代的燕妮来了。”这就是陶乐颂，她用一种无所畏惧的态度，坚定的走向关在木笼里的赵金星致以问候。赵金星，北京四中学生，当时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独裁者，而他是真正信仰和研究马列主义的，并自喻为第六里程碑。他因《中学文革报》和“出身论”的牵连被做为重刑犯关在木笼里。据说当时并没有拘捕他的女友陶乐颂，而她自称为七十年代燕妮并屡次到公安局抗议对赵金星的刑事处罚，后来甘愿和赵关在一个地方，以表示对正义和爱情的坚定与追求。

事隔十几年后，在纽约碰到一位由于受达赖牵连而曾入狱的一位西藏朋友，他当时也和他们关押在一起，说到他们当年那段艰难的政治爱情故事，至今都是非常敬佩的。

（二）在拘留所里有一个文静、清秀、沉默寡言的女学生，她叫闻佳。她有着善良的天性和不屈的气节。常常帮助同宅的难友。大家都很尊敬和喜欢她。因父亲在解放初期被镇压，于是她在课桌上留下了要为父亲报仇的字迹而遭到逮捕，正在等待宣判之中。她常被拉出去受到群众的批斗。有一天她预感到最后的日子到来了，因外面传来消息她可能被判死刑。她从容的穿上了一件珍藏很久的园领白衬衫去迎接对她的命运的宣判。当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时，得知她被判了二十年徒刑。第二天她将要被送到不知何地的监狱去。这位朋友在她离开之前为她写了一首送行的长诗，她收到后也匆匆写了一张临别之前的留言：太谢谢你给我的这首诗和鼓

励，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切，虽然我渴望自由，但我却要在狱中渡过我的青春。

我和同村的朋友们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带着无限的感伤、怀念和无奈，回味和探讨着闻佳的遭遇。最后在我们一致的要求下，这位朋友画了一幅闻佳的素描肖像，因为他是一位不错的画家。一张清纯、秀丽的脸，梳着两条齐肩的油条辫子，圆领的白衫。肖像底下配上了他曾给闻佳的诗句：轻挥泪，为君行，此泪不叙儿女情……。他发誓说这幅肖像和闻佳本人一模一样。我们也坚信她就是我们心中的闻佳。

二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经历了无数政治风云的变幻，林彪的死，四人帮的倒台，文革的结束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从来都没有忘记遇罗克和闻佳，对于仍然活在世上的闻佳，我曾无数次的祝福她早日恢复自由之身。

听说遇罗克死前表现极为镇静与无畏，他怕牵连其他的朋友，而承担了所有的罪证。当局甚至不敢以“出身论”和他反血统论的主观意识为定罪根据，只能以“暗杀毛主席”的莫须有罪名给他判了死罪。

无论是遇罗克还是闻佳，他们正值青春年华却为争取一个做人的基本权利而献身于那个不可理喻的疯狂年代。

□ 原载《北京之春》41期1996.10.

~~~~~

【特别审判】

罪与罚——给林彪、江青集团主犯量刑

• 图们 • 肖思科 •

1980年底到1981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开庭审理了77天。这是漫长的77天，作为当时曾经尝够“文化大革命”之苦的人们来讲，“过程”似乎并不重要，大家关心的是“结果”——怎么判？人们把这次审判和审判结果同邓小平出台后的胸襟联系在一起，同中国是否选择依法治国之路联系在一起。1981年初，人们对“林、江集团”主犯怎么判的关注已到白热化程度！

◇ 特别法庭八面临风，人民的声音回荡在人民审判庭

众所周知，适用这次审判密切相关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在1980年就已生效。社会各界对于“罪”与“刑”的尺度早已有所了解。加之大众情绪集中，所以在审判中，部分新华书店的《刑法》小册子就被群众抢购一空，人们对被告量刑幅度各抒己见。

早在开庭后的审理期间，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就向法庭转告了他们的意见。

有的人提出：“黄永胜、吴法宪应判17年有期徒刑，邱会作、李作鹏应判15年有期徒刑。判轻了说服不了人。江腾蛟谋害毛泽东主席，这条罪行严重。但未遂，认罪态度较好，有自首情节。”

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说法更多。

接着，中央、国务院直属各机关，海、空军等单位分别提出判刑意见：

江青、张春桥应判处死刑或死缓；

黄、吴、李、邱、江在历史上还做了一点贡献，他们是革命出身的，且认罪态度较好，因此最高刑应比江青案量刑低……

这些意见从各个渠道送到特别法庭。

在今天看来，这些意见未免带有想象成份。因为根据联合国有关人权规则和我国《刑法》，被告在宣判前，不做有罪论处。依此，说具体的判刑意见，似乎有些不合逻辑。

许多专家事后评论：从表层看，这似乎有悖法律。但也不能排除这样两个因素：一是林彪、江青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和造成的后果是千万人有目共睹的。对于人们来讲，法庭量刑是一回事，他们心中也有一杆秤。二是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在履行法律程序上，人们还带有过去的惯性。在量刑的问题上，不仅许多机关和群众在中途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许多领导人，包括华国锋、李先念、邓小平等人在许多场合也有言辞。

特别审判庭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在开庭审理期间曾组织全国 6 万多代表旁听，他们均发表了量刑意见。

1980 年 12 月，全中国几百万官兵的代表在京西宾馆对 10 名主犯量刑进行过投票，并提出一张“单子”：

投票人数 88 人。

江 青：死刑并立即执行 / 33 人；死缓 / 48 人；
张春桥：死刑并立即执行 / 36 人；死缓 / 46 人；
姚文元：无期徒刑 / 65 人；20 年 / 11 人；
王洪文：无期徒刑 / 17 人；20 年 / 49 人；
陈伯达：无期徒刑 / 32 人；20 年 / 27 人；死缓 / 15 人；

这是军心。

早在合议庭评议前夕，还有更多的群众来信直接寄法庭、审判长、审判员。

第二审判庭审判长伍修权将军曾收到两封信。

广东紫金县一位中学老师的来信言简意明：

“这些人罪恶滔天，不杀不能平民愤，伸张正义。如果谋杀前国家主席及前总理的罪犯都不处死，那么我国就应宣布免除死刑。”

吉林四平市一位工人致信：

“中国刑法规定，反革命犯、刑事犯的最高刑罚是死刑。林江反革命集团是我们建国以来最大、最严重的反革命杀人犯，成千上万的革命者，我们的老同志、老前辈都死在他们的刀枪

棍棒之下，如果对这些切齿痛恨的反革命还不判死刑，搞重刑重罚，那就将开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下面学着重刑轻罚。刑不上大夫，何谈法律尊严？刑法将是一纸空文……”

此时，不仅国内关注，国外也风云四起。

特别法庭在八面临风中接近协议！

◇ 这是一次刑事审判，江华强调依法量刑

当时，全国虽然一片喊杀声，但特别法庭的法官们还保持着镇静。

依法量刑！不依法办案的话，一切将前功尽弃。江华、伍修权、曾汉周和黄玉昆正副庭长向法官们下达指令。显然，他们的口径里透露出了至少是彭真的支持。

为此，法官们一直在认真学习适用的法律。著名法学家张友渔、人大法制委员会领导王汉斌、杨秀峰纷纷发表文章和回答记者提问，对《刑法》使用规则进行解释，使人们坚信这是一场刑事审判无疑。

特别法庭坚持依法定罪量刑。但法庭是人民的法庭。它得注意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重刑，是一种趋向。但作为审判有一种更深厚的意义是昭示“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况且当时国内情况已转向安定，即使不杀，也不会产生后患。也有人主张从轻判处。

但是，没想到这些意见引起轩然大波，如同地震一般。有区别的是震中在北京，反馈来自上海。

就在此时，上海给中央呈送了一个报告。报告内容是请示杀掉马天水。

马天水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一个成员，曾经是上海市负责人。

这份请示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

谁都清楚，这是一种“逼宫”的意见。上海人要求重罚重判。我杀掉集团的成员，不怕你不杀主犯。

多少年后，当年参加审判的几名法官回忆认为，杀和不杀，重判和轻判并非不依法量刑。我国《刑法》中对各种罪名的量刑原则又有具体尺度。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特别是江青、张春桥，按他们犯的罪不是不能判处死刑。但有几个因素要考虑：首先要考虑的是他们的犯罪背景，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犯的罪。其次要考虑对我国安定团结因素的影响。第三，还要考虑主犯们的一贯表现和犯罪后的认罪态度，从重、从轻的情节。

在这些问题上，身为中国第一位担任特别审判庭庭长的法官江华有自己的考虑。他为此向同仁坦露自己的思想：建国以来，我们判处重大的反革命犯，历来贯彻少杀的方针。这是延安时期形成的，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稳妥的。同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不只是10名主犯的问题，各地的成员都还未处理，这样处理，有利于团结教育他们的子女，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分化、瓦解敌对势力。此外，从国际影响和涉及到后人评说的角度考虑，都以不杀为宜。古人讲：乱世施重典，兴邦用轻刑。我国当前形势大好，对这些主犯完全可以不杀，也是有信

心有力量的表现。

这是中国大法官的考虑。

这也是中国特色审判的一部分。

不久，杀声果然有些平息。

◇ 特别法庭依法独立审判。面对法制新课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参与法庭决策

尽管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审判，只是邓小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大棋盘上的一颗小棋子，但邓小平始终特别关心。

据当时的审判庭副庭长黄玉昆将军透露：“小平同志从头到尾关心这场审判，每次庭审录像都送给他看……”

审判是顺利的。这一点邓小平已从录像和电视中看到。但怎么量刑？这是一个三思而后行的问题。他知道，现在对这个问题议论很多，这不是臆断。他手头就有一封信。是不久前民革副主席屈武写给他的：

小平同志并转中央：

江青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如不处以死刑，则：1、不能为死者申冤；2、不能平民愤；3、使其余党存死灰复燃的幻想；4、使心有余悸的人担心将来变天。以上几点都不是从法律角度考虑，如按刑律，罪不至死当然可不判死刑；如依法应判死刑而不判死刑，则将铸成大错。

外国人将在这次审判中考验我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成立的特别法庭，是真正能独立行使职权，还是他们一贯认为的“橡皮图章”。华主席向外宾吐露不判死刑，外国人已有看法。我想这问题中央一定考虑过，我建议中央重新考虑。如果依法判处死刑，除大快人心外，丝毫不影响华主席威信，恰恰相反，证明我们国家现在真正不是“一言堂”了，而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了。反之，如果按刑律应判死刑而不判死刑，则我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威信将从此下降。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价值，在外国人眼里也不值几文了。事关重大，故敢直言。意见当否，在所不计，中央自可权衡轻重。一得之愚，仅供参考。顺致敬礼！

屈武先生提到华国锋同志在公开场合提到对这些被告不判死刑的问题，它是审判前中央对审判后处置这些人的看法的一部分。包括邓小平自己，也说过一些看法。但是，随着审判的深入和逐渐走向司法轨道，中央的表态的确少了。

特别审判指导委员会请中央定夺。历史选择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来参与法庭决策。

中央政治局带着历史使命召开了会议。

据参加审判的副庭长伍修权将军回忆：

“由于两个集团民愤极大，开始准备判处死刑。但反复考虑不行。一要顾及国际国内的影响。二要顾及后人怎么看。不能以一时义愤来决定。这样，关于首犯杀不杀的问题经过多次反复讨论，老是定不下来。光是提出江青、张春桥二人一定要杀，以后又认为不杀为宜。后又说

还是要杀。我们也决定不了。最后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我也去参加了。政治局多数同志提出判‘死缓’。即依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这在我国刑法上有明确的规定，是允许的。最后，我们充分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很快得到各审判员的支持……”

◇ 合议庭上杀与不杀争论不休。江华以理服众人。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1981年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召开第四次全体审判员会议，35名法官除出国的人外都到会，讨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判决问题。

当会议进入到下午时，审判员们对有的被告罪行是否适用《刑法》第一百零一条，即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的问题，进行了一场新的辩论。

主杀者仍然有人在。特别是一些民主党派的代表。

杀不杀？是杀个别，还是杀几个？

若判死刑是立即执行，还是缓期执行，这是合议庭争论的焦点。

这样的大案，没一个杀头的，怎样向全国人民交待？据当时会场情况看，此时还没有笃定。

这次合议庭的评议由江华主持。此时，只有他出来讲话了。关于量刑问题他已讲过多次。现在他不得不重申，大家要把目光放远，把问题考虑周全。他给大家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若杀，国际影响考虑不考虑。

这句话份量很重。当时，已有部分人知道在世界一些国家对主犯们尤其对江青的量刑非常关注。在驻外大使馆门前，已经有人示威。

第二，我们考不考虑后代人对我们怎么评说？

这席话给沸腾的会议带来了冷静。

为此延会到第二天，从上午9点到下午6点，才形成统一的意见，到会审判员一致举手通过判决书。

1981年1月22日。人民大会堂，天津厅。

特别法庭第五次全体审判员会——合议庭评议。对于江青、张春桥的量刑，审判员很快取得一致意见。但在王洪文的量刑上，暂时意见不统一。社会上曾传闻王洪文曾说过：“10年以后再见分晓”，怕对他判轻了可能还会出来起作用。此事黄玉昆将军澄清了事实，他认为对王洪文的判处不在于他一句话。而是他地位高，罪行影响仅次于江青、张春桥，同时他是上海“造反派”的头子；此外，他还参与了武装叛乱。从犯罪事实上看，应当重判。所以，当时法官中主张重判者占多数。

最后，法庭在有的持保留意见的情况下，以绝对多数的举手，形成了对被告的判决：

江 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观后效，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观后效，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姚文元：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王洪文：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陈伯达：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黄永胜：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吴法宪：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李作鹏：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邱会作：有期徒刑 16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江腾蛟：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以上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自判决之日算起，判决前的羁押时间，以羁押一日折刑期一日。

本案为终审判决。

□ 摘自《东西南北》1995 年第 8 期，原载《书摘》

~~~~~

# 【资料汇编】

## 文革中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 欧阳龙门 •

本文概要描述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整肃的统计结果。

“附录一”列出了文革前的 13 个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这里的统计除去了以下几种情况：

- 1) 宋任穷、李雪峰、乌兰夫、柯庆施、刘澜涛、李井泉、陶铸等人纳入《文革中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 2) 担任兼职政委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全部纳入《文革中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
- 3) 在地方兼职担任第一书记的王恩茂和张国华也纳入《文革中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

除去以上三种情况，13 个大军区共有专职司令员和政委 21 人。文革开始后，“林彪事件”以前被打倒 9 人（43%）：

黄新廷、郭林祥、杨勇、廖汉生、秦基伟、陈再道、钟汉华、李成芳、刘培善。所有这些都未进入九大。其中刘培善于 1968 年自杀。

最先被打倒的是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政委郭林祥，文革开始不久就被撤职。1967 年 5 月，《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将他们定性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韦杰、甘渭汉接替主持成都军区的工作，但是不久又因为“镇压造反派”而被打倒，换上了梁兴初、张国华。“林彪事件”以后，梁兴初又被撤职。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于 1967 年 1 月被打倒，郑维山、陈先瑞接替主持北京军区的工作。“林彪事件”以后，郑维山又被撤职。

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于1967年2月被接到北京软禁，由政委李成芳主持昆明军区工作，并担任云南省军管会主任。后来李成芳也被打倒，谭甫仁接任司令员兼政委。

1967年5月，内蒙古军区调整为省军区，划归北京军区。

1967年7月，武汉“720事件”后，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被打倒，曾思玉、刘丰接替主持武汉军区工作。“林彪事件”以后，刘丰又被撤职。

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在1967年3月率工作组到南昌支左，不久就遭到批判。以后被调到北京参加中央学习班。1968年5月8日，在北京学习班驻地的锅炉房中上吊自杀尽。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

1969年12月，西藏军区调整为省军区，划归成都军区。

这时候的11个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见附录二。除北京军区外，其他10个军区的司令员或者政委中都有一人任所在地的革命委员会主任。

“林彪事件”以后，除去自杀的刘培善以外，杨勇、廖汉生、陈再道、钟汉华、黄新廷、郭林祥、秦基伟、李成芳都获得了解放。杨勇、秦基伟、李成芳三人在十大进入中央委员会。

因“林彪事件”的牵连而解职的有5人（24%）：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福州军区政委周赤萍、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

另外，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谭甫仁被刺杀身亡，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因病去世。

经过1975年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十一个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见附录三。

粉碎“四人帮”以后，丁盛、冼恒汉受到整肃。这时候的十一个大军区负责人见附录四。

附录一：1966年文革前的13个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政委：曾绍山（第二政委）  
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兼第一政委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第二政委）  
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第一政委

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乌兰夫  
乌兰夫同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袁升平（第二政委）  
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兼第一政委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杜平（第七政委）  
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兼第一政委，已去世  
唐亮为第二政委，已调出



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兼第三政委  
肖望东为第四政委，已调出  
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兼第五政委  
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兼第六政委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政委：刘培善（第二政委）  
福建省委书记叶飞任兼第一政委

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政委：刘兴元（第二政委）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兼第一政委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  
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兼第一政委

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政委：冼恒汉  
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兼第一政委

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王恩茂  
王恩茂同时任新疆自治区书记

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政委：郭林祥（第三政委）  
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兼第一政委  
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兼第二政委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委：任荣（副政委）  
张国华同时兼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政委谭冠三 1966年底调出

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委：李成芳（第二政委）  
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兼第一政委

附录二：1971年“林彪事件”前的11个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政委：曾绍山  
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政委：陈先瑞（第一政委李雪峰）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袁升平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杜平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政委：周赤萍  
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  
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  
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政委：冼恒汉  
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政委：肖思明  
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张国华  
昆明军区司令员兼第一政委：谭甫仁

附录三：1975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后的11个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委：曾绍山  
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政委：秦基伟（第一政委纪登奎）  
济南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肖望东  
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廖汉生  
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政委：李志民  
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第一政委 韦国清  
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王平  
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政委 冼恒汉  
成都军区司令员：刘兴元，政委 陈先瑞  
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第一政委 刘志坚  
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 郭林祥

附录四：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1个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委：甘渭汉  
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第一政委：秦基伟  
济南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肖望东  
南京军区司令员：聂凤智，政委：杜平  
福州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政委：李志民  
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向仲华  
武汉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第一政委：李成芳  
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第一政委：肖华  
成都军区司令员：吴克华，政委：钟汉华  
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委：刘志坚  
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第二政委：郭林祥（第一政委赛福鼎）

~~~~~

【往事如烟】

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五）

• 老 田 •

（续上期）

我一进看守所，就听到一片悲愤的歌声，一片骂声；什么“打倒法西斯保皇派”，“八一五是叛徒”等等；唱歌的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隔了三天，我就抗议，要求见他们的负责人，他们把我喊到正规的审讯室，来了七八军人，中间一个胖子自我介绍叫刘润泉，是五十四军政治部主任，还有曾辉平和李凡，他们笑嘻嘻地对我说：黄廉，你们搞文革无非是夺权吗，给你官当你不要，你们造反军要砸烂革联会，硬要反对，我们几个今天来找你，是告诉你，我们在革联会还给你留着位子的。我说你们谈的我一点都不懂，我只要你们回答我，我到底犯了那一条王法。曾辉平说明黄廉刚刚下火车，就抓进来了，你是不知道，我们这是镇压反革命，你们反对革联会就是反革命。我说你们算啥子东西，毛主席说还是要建立革命委员会，你们的革联会是个什么东西？我们抗议生活不好，他们表示立即改善伙食，晚上就给我送两份菜来了。那个时候公安局已经不管事了，已经军管了，是五十四军说了算。

又过了三天，54军的曾辉平又来找我，说今天找你是准备放你出去，你出去之后不能再回文联那边了，罗广斌自杀了，你不了解，也不要过多介入，革联会是经过群众推选，也有市委干部，是革命的三结合，就是现在的权力机构，也为你们留了席位，你们不派人来，八一五就比较听话，各组织都派了人。另外，你老婆在七军医大学，105那个组织也比较被动，就象你们现在这个情况，受了些委屈，你要正确对待，还是要跟我们合作。我们是镇压文革中间的坏人，你们那个组织是反对革联会的，都当作反革命镇压，要做解释，也算是道歉。省委写的信你为什么不出来，这是你的不对，你从北京回来为什么不到五十四军来报到，所以才发生这种误会。你们砸派的大小头目都是抓了的，听曾辉平介绍以后，我愤怒无比，我说你们完全是强盗逻辑，你们就那个水平，喊中学生来抓我。他还说“你不要直接回家，五点钟左右车子直接来接你。”曾辉平走后，公安局的人说：“黄廉，是五十四军和革联会与你们的矛盾，不要怪我们咯。”

接我的华沙车，直接开到54军军部里头，在一个会客室门前，参谋长耿志刚站在门口，伸出手来，我拒绝跟他握手，他说：“你受苦了，对不起了，在大巴山张国焘搞肃反的时候……。”我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说：“你们到今天还是处在学习张国焘的水平上”。他很尴尬，一会儿韦统泰进来了，说：“黄廉，这是个误会，学生把你捉起来，我们发现晚了，是我们的不对，看你还要点什么东西不？在我们招待所先洗个澡，理个发，现在北方天气很冷，你穿的太少，你这点衣服抗不了寒。”我说我刚刚从北京回来，还去北京干啥？他们说这是总理叫你去，还叫成都军区派飞机送你去，他们明天才能安排，今晚你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启程。一会儿有个军官急急忙忙走进来，说马上要走。这个时候，他们要我写个条子给我老婆，要什么东西他们马上派人去取。

不到二十分钟，我老婆就坐个军用三轮摩托车进来了，她很生气，一进来就骂他们：你们给我们解放军丢人，韦统泰说：政治斗争嘛，就是那么回事。我老婆这才系统告诉我重庆发生了什么事，在我回来之前，他们搞了一派夺权，利用叶剑英搞的二月镇反，四川一个晚上就抓了十二万人，他们还把标语贴在我的门上，抄了我们的家，砸派起码有上万人去北京告状，全国的“逆流”四川最厉害。周总理晓得你回重庆之后被抓了，亲自指示他们要用飞机把你送到北京去。她还告诉罗广斌被他们害死了，没有讲完耿志刚就追着喊我上车。接着后勤学院的张龙宝也来了，胡子老长，已经被关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革联会一成立就被抓进军人监狱了，他抱着我哭，说感谢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心。过了一会，前副市长段大明也来了，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军队喊我来，准备解放我。”韦统泰说你要和段大明结合，我说你是不是走资派，错误要不要改，段大明连连点头说“重罪在身，当然要改。”

上火车之后，他们全部买了软卧，独把张龙宝放在硬卧车厢，我即向耿参谋长提出，要他们将张龙宝同志换过来，最后只好同意了我的意见。张龙宝告诉我：“我们这一场惊险，并非个人原因，而是重庆革联会借二月逆流的尾声来镇压我们这一派，造反军坚持反对就遭到他们的镇压，五十四军搞的一派夺权中央根本不承认。”在火车上，军队故意安排段大明与我一个车厢，我对他很不客气，想他既然跟军队搞在一起，自然是参与镇压阴谋的，我问他是谁喊他跟我们一起去的北京的， he说是军队喊我去结合的。最后他自己表白说，自己曾当过红军，待遇已经够了，现在只想去搞柑橘研究所，当个所长就好了。

八、一步到天涯

到北京之后，接我们的车已经等在那里了，一车送到西苑宾馆，把我安排了在西二楼的大套间，我问耿志刚住这么宽干什么？ he说是按照市长的标准安排的三套间。我没有想到，自己从监狱一步跨到“天堂”，就好像是做梦一样。

晚上专车送我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主席台上有周恩来、康生、江青、吴法宪、叶群等人。江青首先问蔡文斌来了没有、黄廉来了没有？54军韩怀志站起来回答说来了。江青说这次在二月逆流之间被抓的同志，你们受苦了，经历了这一次反扑也是一次锻炼，不要以为干革命会安然无事。你们四川一个晚上抓了十几万人，连李大章、天宝这样的老同志在一夜之间都成了反革命，成什么话！江青喊我讲话，我说我从北京回重庆，还没拢屋就被抓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人，我什么也不知道，江青说你还不明白这是个路线问题吗？

叶群起身跟江青说悄悄话，总理说，好了，现在开会。总理说现在该到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这次请你们来议一议，商量一下，四川问题怎么解决。中央审查了刘张的问题，我看了他们的全部档案，他们确实是受李井泉迫害的好干部，准备参加省革筹的工作。四川一个晚上抓了十几万人，哪有那么多的反革命，那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凡是二三月份被关押的同志，一律平反，这样就否定了二月镇反。开完会我出去转了转，再回到西苑饭店，总理的联络员温伯华来找我，问我“你跑到哪里去了？江青同志和你们四川造反派头头照像，到处都找不着，到北京来开会要守纪律，出去要等会开完了才能出去，是总理叫我跟你谈谈。”

五十四军搞革联会十分草率，把学生拢起来就成立权力机构，有了阻力就把另一派的人都抓起来，这是不对的。总理插话说，给你们都讲了，要你们要一碗水端平，干部结合不能是“拉郎配”，这样也害了干部。总理批评我说，你不要出去串联乱跑，还要开会，重庆的问题还要单独开会，还要把八一五的代表请来，不要到时候又找不着你。第二天又用车把我送到人民大会堂，先是谢家祥找我个别谈话，他说“黄廉，你也当过兵，军队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都是听军委的，听成都军区的，过去的事情我也看清楚了，重庆的问题，我看你还是要与我们合作，团结起来把重庆的问题解决好，这是中央的要求，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不依靠军队恐怕不行。一会就要开会，专门解决重庆问题，希望你对团结、联合作出贡献。我们先交换一下看法，谈一下，等一下我还要去给总理汇报。”我说“谢政委，是你们不联合，不搞团结，而不是我黄廉不联合，你平心静气地想一想，重庆搞那个不三不四的革联会，跟我们商量过吗？对结合的地方干部，征求过造反军等群众组织的意见吗？你们在二月逆流中间镇压我们，支持一派学生砸、抄我们的总部，把我们抓进牢房，怎么还怪我们不联合？既然中央领导和成都军区的领导都要参加解决重庆问题，我们就在会上谈吧。”

我回到会场，看到了54军的蓝亦农、军分区的唐兴盛，还有八一五的周家喻、熊代富，重庆日报的沈世民、文联的杨益言、重庆大学的徐光明，造反军的朱正坤，文艺界的王以时，一共有四五十人出席会议。周总理拿着一卷文稿，招呼刘结挺、张西挺、谢家祥等人上台就座，一面把文稿展开进行改动。我坐在第一排，能够看清楚文稿是写在新华社的稿纸上，上面有很多处改动，周总理按照名单一一核对了与会人员，然后就宣布开会，问到结合干部时，总理问辛易之来了没有，辛易之站起来，我举手要求发言总理同意了，我就说辛易之有明显的派性，参加了革联会，坚决反对结合辛易之。总理批评说：不要象在广场上一样，搞政治要学会协商，你听一个就反对一个，那你提一个，回去准备成立市革筹。我说，前段时间我受迫害，关在牢房里，没有机会了解干部，如此唐突，现在也却是提不出。周总理点了一下头，看来还是先让部队承头，接着就念了关于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五条决定。革筹组组长是五十四军蓝亦农，副组长刘润泉和唐兴盛，黄廉、周家喻回去也参加一起筹备。从现在起，临时权力由革筹掌握，从此军队干部进入市委市人委主持日常工作，边筹备边工作，重庆市实际上进入军管。

周总理但是还强调对工人造反军要完全平反，由市革筹和军管会出公告，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都要平反，在单位内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通知也要平反。谢家祥讲话表示坚决拥护，说回去保证一碗水端平，决不支一派压一派，希望群众能够谅解过去工作上不注意的问题，没有承认错误。周总理说，黄廉你回去要做同志们的工作，矛盾的双方时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的，要注

意骄兵必败，回去把革委会筹备组健全起来。

在西苑饭店期间的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成都军区前司令员韦杰同志找到我，把我拉到食堂的毛主席像前面，流着泪，说“黄廉，现在我在毛主席跟前给你道歉，我当众三鞠躬，对不起你。”我看到他这个样子也很感动，他是老红军，少数民族出身，性情很耿直，有了错误转变得比较快。

在西苑饭店的时候，聂元梓过来找过我，还照了像，问我一些情况；北师大还请我讲四川的二月逆流，做了几天报告。国务院五一节安排我去天安门观礼台上看焰火，当我看到焰火在空中的变幻，非常感慨，生活上的事情也是此一时彼一时，前几天他们还抄我的家，要对造反军斩尽杀绝，现在中国的问题确实太复杂了。我回到重庆之后，五十四军找我传达中央否定二月逆流的指示，从此又是作不完的报告，搞不完的宣传。周恩来在北京告诉我们：刘张是好干部，但不服气的人却骂他们是“烂萝卜”，新的不祥之兆又露端倪。

九、分歧升级到武斗

周总理4月28日接见我们的时候，八一五还说砸派反军，不讲道理。周问砸派是什么意思？八一五的人说就是打砸抢，砸乱革联会。我说革联会是五十四军帮助捏起来的。刘西挺说你们造反军也不能代表全部重庆，还是要团结。我说准备联合起来成立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造反到底。刘西挺说，那就叫反到底吧，反到底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和解决重庆问题的“红五条”向社会公布之后，八一五里面有些人不服气，工厂里面贯彻有阻力慢慢地体现出来了。原来市委组织的老保在“12-4”之后被打下去了，军队支持的一派夺权也被否定了，中央支持我们，全国的造反派都支持我们，我们在政治上占了上风，有人说八一五是新老保，这不是很恰当，八一五在重庆最先起来造反，现在个老保的名声，我不太接受。他们不是天生保守，是错在别人利用他们的私心搞一派夺权，后来他们又利用“二月镇反”去打击陷害反对他们的人，是犯了错误。

军队不转也得转，虽然在感情上一时难以扭转，但他们也不敢公开跟中央文革叫板，现在看起来就要实现真正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了。这时，八一五内部在思想认识上也发生了分裂，还是坚持他的组织，自己另起名字、打起旗帜，有些也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也有一些人倾向反到底，还有的干脆宣布参加到反到底一边来，反到底感到扬眉吐气。当时周家喻提了个口号：稳住阵脚，准备再战。

在军队的默认下，革联会没有解散，作为八一五的群众组织保存下来。当时反到底内也有些人要砸烂，公开取消，我们认为当时中央已经有明确规定，已经不承认它了，也有了“革筹组”了，就不需要再去刺激他们。后来革联会也就自行消失了，事后看来我们的处置方式还是对的。文革中间，我们体会到：团结很重要，但只有在斗争中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在真理的旗帜下才有真正的团结，虚假的团结和联合是没有价值的。大联合要以大批判开路，6月份的时候，我们要召开批判李井泉的大会，当时是八一五掌握着李井泉，他们不给我们批判，企图是不叫我们掌握批判走资派的主动权。我们只好扎了一个稻草人写上李井泉的名字，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30万人大会搞缺席批判。会场上造反军在二月镇反之后，展现出来的巨大愤慨，至今历历在目，批判完了之后就把草人烧了。这个事情后来感动了中央，周总理说毛主席都知道了，还引用了一句毛主席的诗来形容，说“纸船明烛照天烧”，这对八一五来说很是恼火，也加深了他们是“老保”的印象。当时八一五是要稳定军心，中央批评之后，他们更是士气大减。

军工系统的产业工人，他们多数出身成份好，也有很强的组织性，有很强的优越感。因此早先不少人被走资派利用曾参加过工纠，工纠瓦解之后，许多人就地参加了八一五派的八一兵团，或明或暗地挑起一些双方的矛盾，早先的分歧和怨气也还没有完全消失，新的分歧和形势又来了。八一兵团出来仍然非常整齐，大有工纠的架势。农民的组织叫红农八一五。

除了大批判之外，还进行了组织上的调整。有些群众组织根据自己对中国革命的理解起了新的名字，例如反到底方面组织了红一方面军。刘结挺和张西挺打电话给我说：这么多的组织，是不是还是团结起来搞大批判。当时初步算了一下，单以几个大系统的称号来说合计有28个组织名称，张国华政委也说：“一定要把大家捏在一起”。这样我们就在重庆市经委设立了“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简称还是“反到底”，省外很多地方只知道反到底。在反到底底下有六大司令部，造反军的负责人还是我兼、工总司班长是李木森、军工井冈山头是邓长春，大专院校红卫兵、二七工人造反兵团、重庆反到底机关司令部、反到底中学生红卫兵总部、重庆反到底延安兵团、重庆反到底农民司令部等。起先各个国防工厂的造反派并不统一，望江厂的叫“金猴战斗队”，建设厂的叫“红大刀”，长安厂的叫“六月天兵”等，这个时候各个厂联合起来才叫“军工井冈山”。反到底这边的农民组织比较复杂，有农民造反军、农革会，二七等。

在重庆文革高潮的时候，在市商业中心区解放碑附近的友谊商店大楼上，反到底建立了“完蛋就完蛋”广播站，与对面群林市场上八一五派广播站对垒。各自发布自己一派的重大事件、新闻，辩论每天发生的事情。市民群众每天六点钟前后就自行集中在那里听，听两派的观点和对事件的看法，广播员都是口齿伶俐、能言善辩之人，双方都是高音喇叭，外地人经过的时候往往也要停下来听一阵子。有时广播上激烈辩论，底下群众也开始辩论，不时发生冲突和打斗，觉得不服气、不讲道理就扔石头、吐口水什么的。反到底方面一个最著名的广播员叫做谢掰掰（左足右拜），他当时在群众中间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市广播电台最好的广播员红声，其实他并不是掰子，他总是这样开头：“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现在反到底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开始广播，由广播员谢掰掰（左足右拜）负责广播。”他讲述一件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气势上咄咄逼人，一件平凡的事情，经他广播的时候下面听众也是鸦雀无声，都愿意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讲完之后，对面八一五的广播就开始反驳。

有一次我下去检查工作，听到广播里的声音有点熟悉，在那里振振有辞，我走到广播室一看，原来是豆腐厂的厂长石有中同志，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那里摇头晃脑地批判《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这个文章，他把我们的批判文章抑扬顿挫地表述出来，说到愤怒的时候，就一拍桌子，下面的听众也往往对他的感情和思想感到水乳交融，他把批判文章跟说评书似的，讲完了之后，才回头跟我打招呼说“对不起，因为我在完成我的战斗。”一次我与周家喻闲聊，他说你们把一个说评书的人，搞来当广播员？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时至今日，许多人仍然不知道谢掰掰何许人也。这个人还是很有政治预见性，思想很敏锐，他曾经问过我“如果毛主席的哀乐之后怎么办”，后来他就萎靡不振了。

后来中央军委将铁道兵的8711部队移来重庆，他们和四川省军区的独二师都是支持反到底，五十四军仍然鼎力支持八一五。市革筹组开始运作之后，市委就彻底瘫痪靠边站了。派性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新的内容。在对于干部的态度上，反到底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说刘张是好干部，八一五和军队说刘张是“烂萝卜”。最初的群众纠纷是辩论“红十条”“红五条”，反到底说八一五不执行红十条，是反对周总理反对中央文革；八一五就说反到底反军、是砸烂公检法的牛鬼蛇神。砸派说八一五参加搞“二月逆流”是走资派的帮凶，是资反路线的二次反扑，他们说自己是跟着军队走。而最关键的五十四军干部的感情始终难以扭转过来，碍着军队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长城，不能把军队搞乱了考虑，当时反到底也不好把话说透，处境就是这样困难。

实权还是掌握在五十四军和原革联会那些人手里，光是中央在政治上的支持是不够的，大家都感到红十条是一纸空文，虽然政治上平了反，也道了歉，但是在基层，八一五的人领不到工资，反到底就有人还是领不到工资。指望他们回头认真搞大联合，完全是幻想。但是有人说，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在北京，支一派压一派的54军在重庆。形势既明朗，也复杂，两派的争论在会上会下都是互不相让，从动嘴巴到动拳头，各个单位都在发生两派对打的情况。到处都说要制止武斗，军队的心态也很复杂，还在动拳头的时候，双方又都在准备钢钎。

十、67年重庆制止武斗努力的失败

第一次大武斗发生在6月上旬，地点是西南师范学院，西师八三一和八一五春雷造反团发生了武力冲突。八一五的人去支持西师“春雷”，反到底的工人、学生去支持西师八三一，都开了汽车过去，双方的支援力量在施家梁遭遇，两三千人在那里荒坡上拦住打。八一五的援助力量是熊代富带过去的，他是八一五总团的实力派，亲自带人去搞武斗，而且是八一五里面仅次于周家喻的头头，明显违背了中央的指示，叶祖禄和军医大学的人、还有军事院校的人把他捉到了，打了一针麻醉药，给他穿上雨衣，作为战俘送到北京去告状，当作一个活证据。他们在车上有两大失误，一是没有解开捆绑，长时间血脉不畅，最后一个手肌肉坏死不行了，幸好未造成残废；另外是麻醉药醒了他们也不知道，最后被乘警发现了，觉得事情反常而把人交给了北京卫戍区。熊回来之后就长期住在五十四军医院里，直到成立革委会之后才出来当副主任，此后他受到鲁大东的提拔，入党当了市委常委，还担任过重庆市团委书记。

各个单位起先的武斗都是棍棍棒棒，拳头，先头是在二轻和嘉陵江桥头，动用体育用小口径步枪。接着大家就开始抢占战略地盘，控制占领自己的单位，医院能控制住就控制住。八一五首先控制了重大校园，继而控制了沙坪坝地区，一经控制住就把反到底统统赶出去，否则就是战俘。反到底的总部在体育馆，到处住满了被赶出来的人，这一片就被我们控制住了。当时的重庆市逐步形成派别割据形势，交通也逐步断绝了。

为了应对紧急形势，六大司令部负责人在滩子口电影公司片库里，举行过一次重要会议，讨论应付重庆的局势。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防空洞，当时的形势已经比较吃紧，从会议地点选择上就可以看出来，反到底六大司令部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上两种观点的争论非常激烈，在争论中间徐光明还因此昏了过去。一种观点是以“左左派”徐光明为代表的“人民战争救山城”的观点，他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们到处在挨打，红十条、红五条贯彻不下来，全盘否定二月镇反只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又不服气，军队支一派压一派，所以武斗不断，因此有的人就要以武斗来对待武斗，在这样的严重局势前面绝对不能右倾，这种观点比较有市场。我的观点是：目前第二次资反路线是对着毛主席的大字报和红十条的新反扑，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疯狂抵制，保守组织和跟错路线的造反派转不过弯来，斗争的复杂性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走资派是坐山观虎斗，我们群众组织之间相争，走资派是渔翁得利。我们进行革命的大批判，根本没有深入下去，我们只有上面依靠毛主席相信党中央，现在解放军还是毛主席掌握的，关键还是要做军队的工作，也要相信中央能够做军队的工作。如果我们行动偏激了，给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造成借口。

我的观点开头是少数，接着我就讲了很多的现实困难，首先是我们没有全面反击的力量，工厂里已有的原材料固然能够生产一些武器，但是后续的供应从哪里来？群众组织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控制，武器流失到社会上，后果完全不能想象；没有任何物质和技术上救助条件，伤员怎么处理？群众和群众打起来，死者算什么，是歹徒还是烈士，这个本身是要由政府来认定的，中央有明确的认可吗？至于后勤给养，就更加不要提起了。我说武斗升级最后无非是两种前途：一是一派消灭另一派，即便是这样，系列后遗症也难以解决；二是两败俱伤。我说实在

不行我们就撤退，别人拿起枪来了，不跑是不行的。

会上批评我右倾的大有人在，支持我的人也不少，两方的意见争持不下，徐光明和邓长春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军工坚决反对，他们可以固守工厂地盘。会上最后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对我的意见比较多。后头我的意见是没有武器的就只有走，不能白白被人杀死，有几十万人跑去内江、宜宾、成都，形成武斗大逃亡。

大概是七月中旬，五十四军副军长白斌说张国华要他们护送我去成都有事，由副军长韩怀志陪同我去成都汇报武斗情况。我坐的是铁路巡逻车去成都，这个铁甲车是制止武斗的装甲专列。我在锦江宾馆向刘张汇报，说“红十条”是空文，军队的立场还是没有转变，每个单位都在发生问题，矛盾在逐步激化，群众组织无法解决实际问题，要害是军队的态度没有根本转变。晚上张国华打电话找我去50军军部，张政委一见面就说打电话到处都找不到我，我说重庆到处都在打架，反到底纷纷被从单位赶出来，打出许多人现在住在体育馆里，我每天都在各个工厂中间奔忙，怎么接得到你的电话呢？他叫我等着他们研究，也要我与五十四军商量。第二天我被喊去军区，在西南局第四会议室，说谢富治副总理来了要见我。谢副总理见面后，问了重庆的情况，我讲了武斗从拳头、砖头到钢钎、枪支的过程，他问到红岩发动机厂的情况，我说很详细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谢富治要我明天去协助他们作些群众工作，他亲自去做五十四军的工作，要我务必出面与军队一起去制止和劝阻武斗，他说武斗再升级对老百姓是不利的。他要我立即回重庆，说两派的头头都要出去把武斗劝阻下去。他是周总理和中央文革派来的，也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文革的王力同志也来了。五十四军有一个师在成都，他说要他们派一个连先遣送我回去。

那个时候武斗到处在封锁，铁路已经是一截一截的，五十四军一个连荷枪实弹、头戴钢盔，分坐了四辆军车，行车接近重庆的时候，在北碚我看到工人都是头戴钢盔，手拿盾牌和钢钎，红岩厂的钢钎多，在这个厂八一五的人被赶走了，从歇马镇到红岩厂一线是反到底控制，我要他们不要主动出击，工人还是买我的帐，谢富治的秘书参谋说你还是有威信。我说过了北碚就是八一五控制了，我的威信就不起作用了，解放军说有这样的情况，就由我们来解决，他们明确告诉八一五的武装人员，是护送黄廉的，我们是从成都军区来的，要他们请军代表出来讲话，一路上到处都是八一五的检查站，完全是一派战争气氛。

谢富治、王力、梁兴初、李再含、刘结挺等到重庆之后，在警备区接见两派各大总部的负责人，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要大家尽力制止武斗。在这个会上就发生了一些事情，还在厕所里发现了匕首。开了会也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省革筹的张国华、梁兴初、刘张都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直升机就已经在54军的靶场降落，谢王午饭都没有吃就离开了，我跟谢王握手问他们能够呆多久，谢家祥说他们马上就要走，据说要去武汉。我拦住王力问，你们这一走我们这一摊子怎么办？他回答说眼下还有比你这里还紧急的事情。我当时对中央代表和省里领导这次来渝抱着很大的希望，没有想到竟然是这样，我急得眼泪都流下来了。

不久就传说邓长春成立了黄山战区，我感到没有这个必要，毛主席还能够控制这个局面，有什么必要“重上井冈山”？不过大批的人趁机跑到黄山上，省得留在下面发生冲突，八一五也没有能力去攻打黄山。

六中又用小口径步枪打伤二轻的一个人，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有的地方就开始抢枪。这个时候，省革筹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都到重庆来制止武斗，试图调解两派的矛盾，在五十四军召开两派头头的会议。正好在那个时候，江青没有明确反对河南二七公社“文攻武卫”这个口号，出现在《文汇报》上，我拿这个报纸去找刘结挺，他不表态；张西挺说刘政委不可能明确解答你的问题，恐怕只能按照自己的处境条件去决定了。我曾经问过王力，如果人家打上

门来怎么办，王力说只有死人才让人家打不还手。我们主张不搞武斗，要是人家逼着你就没有办法了，只有自卫。

我问梁兴初：这么多人被打出来怎么办？梁兴初的口气很硬，要动员大家回原单位去，五十四军和军分区也跟着施加压力，我问安全怎么保证？结果他们都不采取安全保证措施，回去一批挨了打，又跑出来。五十四军的派性还藏着和掖着点，梁兴初自恃“老子功劳大”，派性公开表露无遗，在九五命令下来之后，他还曾经公开支持八一五持有枪械，这是1968年武斗余波的伏笔，九一三之后他作为“林彪死党”，这才从四川的政治舞台上消失。

第二天我回到工总司去，中学生跨着冲锋枪闯进来，把我团团围住，逼着我签字去军工要枪。我说这个字我不能签，他们把刺刀拔出来插在桌子上。我说谁打响第一枪，谁的责任大；而且只要全面武斗一打响，就没有了是非和界线，今天我们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如果是全面武斗，赶出来的人还要多，吃饭怎么办？每个人的供给都在单位，吃饭谁给钱？武斗升级死伤必多，军队有编制，武斗的伤员怎么救治，阵亡留下的孤儿寡母怎么办？学生们说怎么能够考虑那么多的问题，人都被他们整成这个样子了，你当什么头头？自然这个时候邓长春成了英雄，威信就起来了，也有支持我的，他们也考虑武斗升级之后的死伤，还有中央认可不认可的问题。徐光明他们写的《人民战争救山城》叫我看，我说你都是抄毛主席的东西多，这样搞下去，就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武化大革命”了，问题还在于：最后的是非还是要用十六条来检验。

那个时候真是进退为难，处处发生问题，到七月上旬的时候，整个城市已经处于割据、对峙和胶着状态，大家都没有安全感，都找不到出路。一天五十四军张处长打电话给我，要接我去军部，说是一二号首长要见我，还不让带随从人员和警卫。我就在体育馆等他们的车，车子来的时候，几个老太太哭着拉住我不让上车，说军队根本不支持我们，怕我去到那里被他们害死。到五十四军之后，耿参谋长说是你的一个老朋友要找你谈心，交流一下意见，他还说制止武斗的事情，我们也在制止，还是要靠你们去做群众的工作。

原来是周家喻找我，我去的时候他正在里面游泳。我同周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我问他学生的事情管不管得住，周说虽然管不到但是有些事情也在做。我说我们还是要团结在“红十条”“红五条”下，第一是要保证我们的人回厂安全，军队还是听你们的。他说你们在施家梁把熊代富捉了。我是从他口中才知道熊代富在我们反到底的人手里。周问我手上有枪没有，我说没有。他也说武斗再升不得级了，不要搞得大家都收不了场。他问你们体育馆发枪没有，我说没有。我反过来问他，他说我们群众手上没有枪，只要需要枪随时都会有。我说：你这是威胁我。他说你这个人自己不说话，我讲了实情，你又说我威胁你。周严肃地说：我们有人看到你们文联屋顶上架有机枪。

回去之后，我找人询问，才知道文联那不是真枪，那是一些中学生担心八一五来进攻，把演戏的道具枪摆在屋顶上，他们还完全不知道厉害，唯恐天下不乱，还说就是要吓唬吓唬那些老保。我知道的真实情况，就马上给五十四军支左办公室挂电话，说明文联楼顶“有机枪”的实际情况。武斗前的那个征兆，真是草木皆兵了。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 (WWW) 地址: <http://www.cnd.org/>
